

评当代西方学者对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胡代光 魏 坝

宋承先 刘诗白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评当代西方学者对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胡代光 魏 坝

宋承先 刘诗白

主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比较系统地评价和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研究的现状。全书共分十二章:(一)百年来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评价;(二)西方经济学者怎样看待《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三)西方经济学者论《资本论》的方法;(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非难;(五)西方学者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议论;(六)西方学者关于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七)西方学者关于“广义转形问题”的争论;(八)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争论;(九)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十)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论战;(十一)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研究;(十二)《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本书可供经济理论研究者,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评当代西方学者对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胡代光 魏坝 宋承先 刘诗白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2.875印张 33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017-0728-6/A·3

定价: 6.95元

编写说明

《评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这本专著是1983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通过的“六五”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由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南开大学魏坝教授、复旦大学宋承先教授和四川财经学院（现改名为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教授负责主编。1985年8月在成都举行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初稿讨论会，经济学界老前辈彭迪先教授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军区政治部等近20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对文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这本专著正是得益于那次成都会议的代表们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而最后完成的。

除四位主编者负责这个研究项目的大纲设计，并对有关章节的文稿进行审阅、修改、定稿之外，直接参加本书编写的有，胡代光教授（第一、二、三、五、六、七章），宋承先教授（第十二章），南开大学高峰副教授（第十章），王庭笑讲师（第八章），郝寿义讲师（第九章），西南财经大学李达昌副教授、易敏利讲师（第四章）和北京大学王志伟讲师（第十一章）。胡代光教授还对本书进行了总纂。此外，曾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进修的屈年增同志为这个研究项目做了一些资料准备工作。所以，本书实际上是集体研究成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许多经济学者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进步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出现重读《资本论》的热潮，发表了许多评论《资本论》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有的是挑战性的攻击；有的是并非怀有恶意的曲解；有

的还是出于维护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观点而对某些人的见解进行批评；也有的是联系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情况而对《资本论》的研究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新的意见，并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分析。因此，我们应放开眼界，知己知彼，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动态，并对他们的论证和观点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实事求是的评论。这是我们密切联系实际，改进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习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是有的放矢地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本书编写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正是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

这本专著的顺利创作，首先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经费资助，而它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当然，本书中的介绍和评论，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恳切盼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编写说明

第一章	百年来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评价·····	(1)
第二章	西方经济学者怎样看待《资本论》的理论体系···	(20)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者论《资本论》的方法·····	(44)
第四章	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非难·····	(65)
第五章	西方经济学者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议论·····	(107)
第六章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马克思的“狭义转形问题” 的争论·····	(136)
第七章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广义的转形问题的争论·····	(164)
第八章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的争论·····	(215)
第九章	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 研究·····	(237)
第十章	西方经济学者围绕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理论的论战·····	(269)
第十一章	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 的研究·····	(326)
第十二章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366)

第一章

百年来西方经济学者对 《资本论》的评价

一、看待《资本论》的态度问题上的 三个重要变化

自从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分别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的整理工作并正式出版，至今也近一百年了。无数事实已雄辩地证明，马克思的这部巨著，在一个多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资本论》今后仍将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宝库，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指路明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的，“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①

然而，一百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在如何看待《资本论》的态度问题上，明显地出现了如下重要变化：

第一，1867年11月2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我的书的沉默，很使我不安。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德国人是非常奇怪的家伙，他们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奴仆所做出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对我的书置之不理”。^②

①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78页。

这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不过两个月的情况反应。所以，《资本论》刚出版初期，资产阶级学者竟妄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①

但是，时隔不久，恩格斯于1868年3月21日和28日就发表了对《资本论》的书评，刊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上。此外，恩格斯还先后在1867年10月至1868年5、6月这段时期写过八篇评介《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

与此同时，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1833~1875，德国政论家，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之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德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在《民主周刊》上均发表过对《资本论》的书评。马克思肯定施韦泽能够理解《资本论》第一卷的中心思想；马克思也称赞狄慈根有哲学头脑^②。杜林（Eugen Dühring，1838—1921）于1867年写了一篇评论《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刊载在迈耶尔辞典的《附录》里，但在当时，马克思认为，这篇书评并没有抓住《资本论》中的新的基本因素。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文章不大满意，不久，杜林便改变态度，竭力地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攻击了。^③

第二，资产阶级学者们对《资本论》由“沉默抵制”很快就转而实行公开污蔑和进攻。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的第二年，即1868年，一个匿名的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就宣称：

“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④ 1867年过后的八年，还有一个隐匿名者，竟然煞有介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页。

②参见弗·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1页。

③同上，第481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3页“注3”。

事地宣布，马克思作为一个“自学者”，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①所以，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由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陆续出版，一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曾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逆流。一方面有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 1857~1943)在马克思逝世一个月(1883年4月)后，就发表文章来伪造和歪曲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在1886年，他更攻击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的第二年(1895年)，洛里亚甚至得意忘形地散布马克思“犯下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从而出现“这样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恩格斯及时对洛里亚的各种谬论给予了有力批驳。^②

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在1884年就在他的《资本与利息》一书中用整章篇幅(第六编，第三章)批评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明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1896年，庞巴维克又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的长篇文章。他在该文中断言：“马克思的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同价值论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的体系同事实毫不相干，他的体系建立在比形式辩证法还不稳固的基础上。”^③

庞巴维克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写《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这篇攻击性文章，据美国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 1910~)的意见，这是因为庞巴维克在他的《资本与利息》一书中，认定“他(指马克思)认为仅仅可变资本与能够获得的剩余

①参见弗·梅林著：《马克思传》，第381页。

②参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序言》和《增补》，《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24页，第1006~1011页。

③见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1949年英文版，第29页，第101页。

价值的数量有关系，不变资本是没有关系的。关于这一点，……与事实相矛盾；因为在事实上，根据利润同化的法则，剩余价值与资本总额——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加在一起——是成正比例的。最奇怪的是马克思自己知道这里有些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说在以后要加以讨论。可是，他这种诺言没有见诸实行，其实也是无法实行的”。^①这样，庞巴维克似乎已深信马克思不能履行他的诺言了，但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确已证实马克思详尽地解决了庞巴维克所谓的“矛盾问题”时，庞巴维克无疑地感到尴尬，于是，他不得不撰文“反驳”马克思，以维护他的“声誉”。^②这种公开的诽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尤为猖獗。例如，

本世纪10、20年代在德国、奥地利流行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中的全体主义（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经济的基础）的著名代表史璠（Othmar Spann, 1878~1950）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他错误地作了如下论断：“（1）马克思之价值理论既根据于价值有实体的性质之观念，此其可以攻击毫无余地者，亦犹乎李嘉图之理论；盖价值本无实体可言，惟附于效用之中焉耳”。“至其剩余价值之理论，……不特以价值理论之谬误，已失其理论上之根据；且变本加厉，并不知工资之决定，不在于劳力之再生产的费用也。”（2）“马克思之工资理论，实仅一李嘉图之工资铁律而已。…果如马克思之说，岂非‘工业后备军’之压力，可以永久使工资降低于生活需要之平线以下乎。是马克思之说，更超过工资之铁律矣。”（3）“马克思…于《资本论》第三卷中，承认仅于特殊情形之下，货物之价格始与‘劳力之价值’相符合，是不啻自弃其价值之理论矣”。（4）“马克思学说之最要部分为资本集中之定律。……此种定律既以不确实之根据而为概括之说明，故仅于有限的情形之下方可实

①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21页。

②参见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导言》，第19页。

现”。(5) 剩余价值之理论及资本集中之理论互相矛盾，至为明显。盖资本集中以后，则用于流动资本者（按即指工资）减少，而用于固定资本者（按即指机器）增加，果如马克思之说，岂非由小工业合并为大工业之后，其剩余价值反因而减少乎。——且资本集中之理论，与惟有活动的劳力为生产之理论亦有冲突之处。果仅劳力可以生产，则大规模工业所用之机器既多而人工较少，又何能较小规模工业为优越乎。”(6) 基于以上论断，史翌居然胡说：“马克思之主要学说，既均非其所创。若详审其内容，则亦平淡无奇，仅一团怨气焉尔”。①

著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于1925年访问苏联后，发表了《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他竟把《资本论》看成“只是一册陈腐的经济学教本”，并声称，“我晓得，这本书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关系或不相适应；像这样一个学说，我怎么能接受呢？”② 后来，凯恩斯在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前一年，即1935年，在致著名英国剧作家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的信中明确说道：他写的这本书将要摧毁“作为马克思理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③ 可见，凯恩斯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自己也公开声明：“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育的资产阶级一边的。”④ 列宁早在1920年就看出，凯恩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⑤

第三，进入本世纪40年代后，特别是60年代、70年代以来，

① 史翌著、陈清华译：《经济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79~168页。

② 凯恩斯著：《劝说集》，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26页。

③ 见哈罗德（R·F·Harrod）：《凯恩斯传》，1951年英文版，第462页。

④ 凯恩斯著：《劝说集》，第245页。

⑤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2页。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看待《资本论》有了较大变化。尽管仍有一些人对《资本论》进行这样那样的指责和非难，但象那种纯粹庞巴维克式的攻击似乎已不多见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往往用“比较研究法”，企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李嘉图和凯恩斯的理论加以“沟通”，即实行“互相补充”，甚至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概念来解说和评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原则。例如，琼·罗宾逊认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消极方面和正统派均衡理论不同，凯恩斯体系与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①她始终断定：“马克思的理论，或至少是马克思在所讨论到的问题上的某些理论，同样是凯恩斯所必需用来补充的，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是马克思所需用来补充的一样。”^②

在40年代、5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盛行于西方世界，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几乎不注意《资本论》的研究。这段期间，在西方只有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对《资本论》进行了宣传和解说工作，其中如美国的斯威齐于194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这本著作在说英语的国家里被认为是解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标准”教科书，迄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又如英国的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和米克（Ronald Lindley Meek, 1917~1978）对马克思经济理论都作了许多解说工作，多布于193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是捍卫马克思经济理论和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流行的主观主义或“边际效用”学派的较有影响的一本著作。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6）和《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发展》

^①琼·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页、第5页。

^②同上，第13页。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1948)也是有影响的著作,这两本书都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进行问题的分析。米克在40年代、50年代冷战时期,对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进行了非教条主义解说。因此,据说他对西方近来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起了较大作用。他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1956, 1973)是较系统地阐述劳动价值学说发展史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西方颇有影响。

二、60年代、70年代以来,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复兴”

从本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热潮。据西德经济学者卡尔·屈内(Karl Kühne)的看法,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

(1)在敌人或朋友中间所展开的有关马克思理论的全 面 争论现在已变得更加活跃。

(2)“学院派”经济学已开始吸收马克思所发展的某些思想观点,特别是把马克思观点结合到经济增长理论的领域中。

(3)在现代经济学本身范围内新的、非正统的发展,正在开始提倡一种“更高阶段”(在黑格尔派的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引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阿朗·博西(Arun Bose)提出的术语〕,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与学院派经济学要进行严肃竞争,而且甚至有时还想象要超过它。

出现以上情况的背景,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70年代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面临着高度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即“停滞膨胀”(Stagflation)的局面,而且国际经济也呈现混乱状态,凯恩斯主义对于这些新的情况和

^①参见卡尔·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译本,第1卷,第3页。

问题既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因此，西方许多经济学者便不得不重新考虑《资本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如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所表现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所引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等）的现实性的一再证明，他们重读《资本论》就形成热潮了。

（2）60年代在美国曾掀起青年学生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出现了一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流派，即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其成员主要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经济学家和一部分研究生、大学生。他们于1967年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随后该协会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的专门杂志。1970年，在英国成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由该会出版了定期刊物《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这些组织和刊物的出现对西方经济学者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兴趣，都有积极影响。

（3）70年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5年）三种手稿被译成英文陆续正式出版，这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学者研究《资本论》的队伍的日益增大，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在这段时期，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论》的另一特点是，企图把马克思经济理论数学化。当50年代资产阶级新古典学派的教义最有影响时，一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便力图使马克思理论“边际分析化”。例如，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断定，即使运用对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分析方法，证明工人得到了他们的边际产量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存在剩余价值的，即仍有剥削。60年代、70年代，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又力图使马克思

理论“线性分析化”。例如，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企图建立各式各样联立线性方程组来论证马克思理论（如生产价格决定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就业水平理论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认为：

“现代数理经济学可以在一两个方面用来与马克思经济学相联系，或是找马克思论点中形式的、数量的方面的碴子，或是对马克思的见解提供新的、精确的表述。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数学家，所以为了要揭开他的论点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利用现代数学工具将会是容易的。更加有兴趣和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以便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在现代经济学中会成为有用结构。”^①

然而，我们认为，数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当然在经济科学研究中是可以大加利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为了论证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以及生产价格的实质等，都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方法。但是，众所周知，现代数理经济学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主要依靠形式逻辑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如果单纯利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而使《资本论》完全数学公式化，那就会阉割马克思理论体系。须知，全部《资本论》的体系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中心，始终贯串着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特别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同时坚持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采用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析到综合的叙述方法，使逻辑的顺序和历史的顺序相一致，从理论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运动规律的论证。所以，尽管定量分析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定量分析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否则将误入歧途。正如列宁指出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

^①森岛通夫等：《价值、剥削和经济增长》（Value, Exploitation and Growth），1978年英文版，第58页。

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① 英国一位年轻经济学家本·法因 (Ben Fine) 曾指出：“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一种模型，所以，即使搞得再多模型，也可能不属于马克思模型的模型”；“靠从事模型建立，森岛通夫等已使他们的方法背离了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在他们看来，价值是一个测量，一种分析的手段，属于数学给予精确化的抽象模型的一部分。相反，马克思关心的则是，例如价值本是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的真实存在”。^② 关于经济研究中的单纯数学观，国外有些经济学者对此也颇有异议。例如，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鲍尔丁 (K·E·Boulding) 强调说，“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是一个极好的仆人，而却是一个不好的主人。数学使我们摆脱纯粹经验主义，但迫使我们成为无知。这既是数学的力量，又是它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我们将成为那么迷恋数学模型，以致我们以为世界实际上跟数学模型一样，可以说是‘无人世界’，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研究价格和商品的运动。”^③ 再如，早在30年代、40年代，就积极倡导应用数学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并在数理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沃西里·里昂惕夫 (Wassily W. Leontief)，近些年来也一再反对西方一些经济学者追求纯粹数学模型的狂热。他指出：“经济理论家们一年又一年不断地制造各种数学模型的根据，并很详细地探究那些模型的形式上特征；经济计量学家们则使可能存在的一切形状的代数函数与上述各种基本论据相拟合，而却未能用任何觉察得到的方式促进对现实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运行的系统理解”。1984年3月，里昂惕夫来我国访问时再次强调：“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理论的资料是没有用的，但没有资料的理论也是没有用的。遗憾的是许多理论经济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页。

② 见〔英〕《经济学报》1980年2月号，第92页

③ 参见惠尔赖特 (E.L. Wheelwright) 编：《激进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74年英文版，第6页。

学家，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并不懂得这一点。大家往往在许多杂志中可以看到许多数学公式，但是看不到数据，假设条件被用来代替资料。假设条件对于这些数学公式是很方便的，这样做可能非常精美，但是没有用。虽然它在逻辑上完全正确，我们仍把它叫做“投入是垃圾，产出也是垃圾”。^①

最近二、三十年来，即使对马克思的评价持否定态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某些偏见。例如：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曾胡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复活是其理论生命力的表现。他说：“大多数智力或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我们的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结在一起，是没有弊病的。按这个意义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毁损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③

萨缪尔逊（Paul A. Samuelson, 1915~）诬蔑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④马克思是“一个小小的后李嘉图主义者”；^⑤但后来他也不得不认为：“马克思在他死后发表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确创新了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和经济增

①见《科学》杂志1982年7月号，第107页，里昂惕夫的“书信”和《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译丛》1984年第3期，第94页。

②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
第11页。

③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

④萨缪尔逊：《当作经济学看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
as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1967年5月号，第623页。

⑤萨缪尔逊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会长演说，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编：《科学论文集》第2卷，1966年英文版，第110页。